

CONTENTS

目 录

- | | |
|-----------------------|---------|
|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上..... | 荣毅仁(1) |
| 党与政府教导、鼓励我前进 | 郭琳爽(17) |
| 一条心，一条路 | 孙照明(29) |
| 始终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 簡日林(42) |
|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湯蒂因(49) |

在向劳动者过渡的道路中

荣毅仁

走出校門，开始做資本家

1937年，我剛从上海聖約翰大学毕业，踏进了社会。我走出校門，沒有遭受到其他大学毕业生那样的命运——毕业即失业的痛苦，很快就到我父亲創办的无锡茂新第二面粉厂去做助理，并且在实际上掌管了全厂的大权。从这一年起，我就开始当起資本家来了。当时，我觉得非常得意；所以有如此的心情，倒并不是因为自己当上了資本家，而是因为从此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我自幼受到父亲的教誨，他老人家看到国家不断地受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国穷民困，認為只有办实业，搞經濟，才能救得了国家。我是深受这种影响的。我父亲看到許多富家子弟，一到社会上做事以后，往往就揮霍浪费，出风头，搞投机，以致墮落破产，因此时常勉励我們：“我家办的紗厂、面粉厂，都是老百姓的衣食事業，你們要爱护它們。”又說：“我們老一輩創業不知經過多少艰难困苦，不知費尽多少心血；你們將來一定要克勤克儉，認真做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所以我在讀書的时候，就鄙視纨袴子弟，立志將來好好做一番事业，当时每逢暑假、寒假，就常到茂新二厂去实习。而当我从学校毕业、走进茂新厂正式做事的时候，

就格外热爱这个企业，每天一清早就到厂，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特别是那时国难当头，更感到自己一定要按照着父亲的教诲，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我在茂新二厂做助理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面粉因军需关系，售价上涨，接着，“八·一三”上海抗战，面粉更为需要。当时我们厂里生产的面粉大都是供应军队需要，我更认为自己为国家做了好事，我在做爱国工作；而且厂里生产足，很赚钱，心中着实欢喜。但是，上海在打仗，敌人近在咫尺，又不免觉得紧张。不久，敌机轰炸无锡，申新厂堆棉花的一个仓库，首先中弹起火，内心更觉不安。以后形势更为紧张，我不得不考虑迁家的事了。不几天，我们全家就离开了无锡。临走时，还要求留厂的职工们维持这家厂，并说：局势一好转，我就回来。其实，那时我对自己的前途如何也是茫然。

离开无锡后，我到了香港，在1938年春回到上海。当时我想：上海租界有英、美、法的势力，在租界里居住，个人安全没有问题。那时上海租界里也有我家办的几个厂，但这些厂早有专人负责，我无法插进去，有时只好到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去闲坐；人家都有事，独我是闲着。我看到有些人对各厂负责人应酬敷衍，对自己表示冷落，使我初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感到非常苦闷。

我感到老闲着也不好，就设法同几个哥哥和亲戚合资开办小布厂，后来又添上些纱锭，搞个小型纱厂，又开了爿铁工厂。那时我们不愿同日本人打交道，但为了保住这些企业，就想靠靠美国人，因此与一个美商接洽，把这些企业挂上美商牌子。受雇的两个美国人对我们拍胸：“美国人的财产，日本人

是不敢碰的。”当时通貨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厂也赚钱。我满以为倚靠美国人的势力，可以维持这些企业，战争结束时，自己可以重回茂新厂工作。不料 1941 年 12 月 8 日，只听得几声炮响，日本人就进了租界。靠美国人是落了空了，企业因为挂了美商的招牌，第二天，日本人就派了监督官到厂。为了不使这些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为敌人所掠夺，我只得违反自己的意愿，去同日本人打交道，申请发还企业。

在日本人控制租界以后，通貨膨胀更是厉害，投机成风，物价飞涨，我这些企业资金短缺，周转困难，常向银行借款，仰人鼻息。企业的经营也极不稳定，有时赚钱很多，有时摇摇欲坠。我们认为只有自己办银行，才能扶植实业。于是在 1944 年，我们兄弟又开设银行，由我兼任经理。等我一当了银行经理，人家就“刮目相看”了，有的常来问寒暖，有的也来应酬敷衍，这与 1938 年我刚到上海时所受到的冷遇对比，真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感。

那时候，从我个人来说，虽不必有求于人，但是看到国家受人控制，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上海有日军的岗位，我总是绕道而过，不愿受人格上的侮辱；我每次看到报上登载敌人打胜仗的消息，就深怨国民党不争气。同时，我觉得日本所以能侵略我国，又敢于同美国开战，无非是有强大的工业，因此更加强了我振兴实业的愿望。在这一时期，我天天盼着胜利早日到来，每天晚间就偷听短波，希望听到胜利的好消息。胜利终于盼到了，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晚上，我从短波中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真是兴奋非凡；全家男女老少也以为好日子终于到来了，从此中国可以由弱国一变而为强国，我们兴办

实业，也一定大有希望。因此，我就等待着国民党政府早日迁回南京，我可以立即收回茂新第二面粉厂，还可以恢复被日军烧毁的茂新一厂。

在帝国主义、官僚資本的压榨下求生存

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时，我准备了一些資金，計劃把厂收回来，早日开工。当时，我一方面去找我离开无锡时遺弃掉的职工，商量怎样开工生产；一方面又备了公文，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管机关申請发还茂新厂，并且亲自前去要求早一点解决。虽然他們口头上一再答允发还企业不成問題，但是一連几个月过去了，还是音訊全无，使我着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人員也实在熬不住了，便暗示我送点錢去，公文立刻可以批下来。我万万想不到要求发还被敌人占去的企业，还要拿出“運動費”。但是，为了企业能早日复工生产，减少损失，我只得照送一笔錢。果然，随着我的錢进入貪官的腰包，“准予发还”的公文也就立刻批下来了。从此，我才开始了解国民党做官的勾当，心想我們办实业的人，應該一心一意搞生产，不必过問什么“政治”。

在交涉收回茂新二厂、复工生产的同时，我积极計劃重建被日军燒毀的茂新一厂。有一家洋行听说我要买机器，便竭力向我兜銷，非常迁就。可是在合同簽訂以后，原来“有現貨”、“可以立刻裝运”等等諾言都是一种招徠生意的騙局。經一再催促，直到 1947 年才运来一部分，第二年方才全部安裝完毕。

为了收回茂新二厂，我花了不少的錢和精力。那时，我認為这些都不要紧，只要厂里开工就好了。我总算盼到了茂新

面粉出厂了。可是好景不常，开工不久，就遭到了“美援”面粉倾销的打击，我办好实业的愿望也第一次感到不容易实现了。我在开始时还没有看清这一点。当时，善后救济总署送来大量面粉，只有少量小麦，我还天真地认为既是援助，而根据中国面粉厂设备有余、原料不足的情况，善后救济总署应该多运些小麦来让我们加工，维持我们面粉工业的生产。因此，我提出了“多运小麦，少运面粉”的建议。那里知道“美援”是假仁假义的东西，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倾销美国的剩余物资，结果，还是运来大量面粉，小麦很少运来，我的愿望落空了。

我们的纺织厂情况如何呢？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南洋各地需要很大数量的纱布，我国纱布出口南洋，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纱厂业务很好。但是这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厚利生意，很快就被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所垂涎，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纱布出口，各厂生产出来的纱布，只能卖给他们，由他们垄断出口，纱厂只能分得垄断利润的残渣。但是国民党政府还不甘心，还要棉纺业买 1,000 万美元公债，我们申新一家就被摊派了 100 多万美元。这还不算，官僚资本还利用反动政权想出各种办法来挤垮我们。在发行伪金圆券的时候，蒋经国硬说堂兄鸿元私套外汇，把他扣押起来，以此威胁棉纺业按其规定的限价出售。后来按限价出售的棉纱，连棉花成本都不到；只有同官僚资本有勾结的人，才能买到便宜的限价棉纱，一般普通商人只能出黑市价格向他们转卖。经过多次的榨取，我们纱厂胜利初期获得的利润，就被搜刮殆尽。

1947 年，反动政府调整外汇，物价波动非常剧烈，宋子文

要我抛售面粉，稳定市场价格。当时，我認為稳定物价是一件好事，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处，是爱国的行动，于是就联合了几家面粉厂一起抛售面粉，暂时也起了一些稳定物价的作用。我很得意，宋子文也很满意，以后他还要我和国民党粮食部一起，做面粉供应的事。但在反动政权和官僚資本統治下的旧中国，物价毕竟是无法稳定的。我这样做，只是上了宋子文的圈套，在客觀上当了維持四大家族統治的傀儡。不久，宋子文下了台，国民党监察院說我舞弊，对我提出了所謂“彈劾”，并向法院起訴。因此，监察院、法院、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反动机关，都乘机向我敲詐勒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还被敲去10,000美元。我真想不到过去自以为帮助国民党政府稳定物价是爱国行动，反而因此受罪，作了国民党內部派系之間爭权夺利的牺牲品。

由此，我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貪污腐敗的国民党政府統治之下，民族工业是絕對沒有前途的，实业救国只是一种夢想；單靠克勤克儉，企业也是不可能立于不敗之地的。可以說，我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經深惡痛絕，希望它赶快垮台。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后，我更看出国民党已經崩潰，为这个反动政权的寿命即將結束而高兴。但是，我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說老实話，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想有一个聰明的、廉洁的政府就好了。我对共产党也是疑惧的。当时听到不少謠言，說共产党实行共产、共妻，資本家要被清算、杀头，不杀也要去做苦工。甚至还听说：济南成通紗厂資本家苗海南在济南扫街。国民党的这些反动宣传，更增加了我的疑惧。那时，上海工商界当中有些人到香港去了。我家也有人主張走，

他們以為在共产党的統治下，一定要吃苦头，不如帶些錢到香港，可以自由些；也有人主張不走，特別是我父亲更为坚决，他認為自己長期受外国人的欺侮，办实业就是想不受別人的欺侮，所以再也不願去仰人鼻息，同时，他又不願离开自己毕生精力所創办的心爱的企业。他更說：“国民党政府是历史上最坏的政府，不可能再有比它坏的了。”我也不願做白华，又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就在犹豫中决定留下来了。

这样一决定，心情倒开朗了。虽然我还沒有消除对共产党的畏惧，但心想共产党来就来吧，来了之后頂多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反正在国民党下面也是搞不好的。記得上海解放前不多时，有位友人还来同我商量到外埠办厂的事，我还劝他：“去就去，共产党来了也沒什么要紧，只要把帳目搞清楚点。”也是在解放前一个月，我在上海的住宅落成，有人劝我不必搬进去了，理由是共产党来了，还不是要搬走。我可沒有接受这番“美意”，还是搬进去了。可是搬进去沒有几天，家門口来了几百个国民党的军队，他們架起了机关枪，要我們搬出去。他們的目的无非是敲詐一番，我只得拿出几百銀元了事。那时我已經兼管申新紗厂的业务，每天就是在敲詐、吃官司、物价波动中弄得焦头爛額，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跟共产党，从疑虑到靠攏

1949年5月24日夜，枪声密集，听說解放军已經进入上海。第二天，我厂一位厂長坐了汽車来看我，說上海解放了。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解放了还能坐汽車？他告訴我：解放军紀律很好，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由于好奇，就同他一起坐了

汽車出去看看，一路上看到的情形，果然如他所說。一回家，我把沿途所見，告訴我的愛人。大家对生命安全是放下心了，但是对今后到底如何？企业怎么办下去？仍旧茫然，很是不安。

1949年6月3日，上海的党政負責人召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我也接到座談会的通知，当时想：“去好呢，还是不去好？”考慮結果，認為“丑媳妇免不了要見公婆”，所以还是去了。在这个座談会上，党政首長宣布了“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顾，劳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并要求大家繼續管理企业，安心經營。还說有問題可以提出来，有困难可以請政府帮助，劳資問題可以通过劳資双方协商解决。当时就覺得共产党能提出这一套办法，还不错，但对將來实际执行怎样，还有怀疑。我就抱着將信將疑的态度回到企业繼續經營。

說老实話，解放初期企业的困难确实是严重的，我的心情也因此而很不安定。那时，解放战争在繼續着，交通阻塞，原料供应困难，銷售都有問題；投机活动还没有扑灭，物价仍然混乱，币制也不稳定，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鎖禁运以及国民党飞机的濫施轟炸，要維持紗厂、面粉厂，确实是很困难的。这时，工人在生活上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更覺得非常吃力。我也耽心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办好經濟。当时，我只有把企业的实际困难向华东紡管局、貿易部、人民銀行等机关反映，請求帮助解决。并且，为了克服困难，我也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購、定貨、加工、包銷、貸款等等。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維持生产，渡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的同意照办，从沒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更使我兴

奮的是，在1949年底，人民政府就大力取緝投機活動，並從而穩定了物價。這又是一個大“奇蹟”。這使我不得不開始信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了，感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辦法，是實事求是的，說得到，做得到，同時感到自己過去10多年未能實現的办好實業的理想現在是可能實現了。從此，我開始認識了共產黨，靠攏人民政府。於是，在推銷1950年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時候，我代表榮氏各企業認購了12萬份公債，表示我以12万分的熱情來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

1950年5月，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代表上海工商界參加中央稅務會議和列席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在政協開會時，有一件事是我終身難忘的。那是在開會前夜的一次宴會上，我第一次見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當時的心情一方面很高興能見到國家的最高領袖，同時又在猜想着國家最高領袖一定非常严肃可畏，恐怕难得亲近。可是，當我見到毛主席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开玩笑地說：“啊，榮先生，你是大資本家呀！”周總理也打趣地稱我是“少壯派”。國家領導人員這種親切和藹和無拘無束的態度，又增加了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在政協會議之前，我還參加了全國稅務會議。當我第一個發言的時候，當時財政部薄一波部長，聽不懂我的口音，幾次要我講的慢一點，以便把我的意見記下來，我一面感到有點難為情，一面又深深地為領導干部這種謙虛和認真的作風所感動。可是在這次會議上，對若干問題的爭執很多，上海的代表們也提了不少意見。當時有一個地區的稅務局長認為，國家如此照顧上海的私營工商業，上海工商界意見還這樣多，真不應該。我聽了很不舒服，立即插嘴說：“政府邀請我們來，原是要聽我們的意

見。如果認為我們意見太多不好，那麼我們可以不提。”薄部長聽見了，就再三鼓勵我們要多發表意見，說人民政府的事是大家商量辦事的，批評了那位局長，對我的態度也提了意見。今天回想起來，當時能積極提出意見，固然是好的，但也應該說，那時提意見的出發點大半還是為了私營工商業的利益，沒有考慮到國家的利益。這兩次會議給我的教育是極為深刻的，它使我在思想上縮短了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距離。會後我覺得，以後光講做生意是不行了，還要多懂些道理。我回到上海，就和朋友們一起，選擇了“七一”黨的生日那一天，成立了學習組織，學習國家的政策和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想只有學懂一些政策和理論，才能好好地跟共產黨走。

在那個時候，對於共產黨，只是感到它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很有辦法，特別對它有好感的是它能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困難，維持生產，從而以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辦實業大有可為。但是也有些問題，常常使自己不安寧，比如在公私關係上、勞資問題上，有些地方同自己想的有抵觸，因此往往引起爭執。當我看到私營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就很開心。那時，我認為是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固然要發展，它對國家和人民有好處，但覺得私營經濟也應該同國營經濟“平行發展，各得其所”，這樣也沒有什麼壞處。也就是，我思想上只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利益，希望新民主主義“長存”、“萬歲”，而並不希望社會主義到來。

兩次嚴重的考驗

正當我們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的時候，突然抗美援朝運動

开始了。这个运动开始时，我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我恨帝国主义，特别恨美帝国主义，因为我曾经吃过它不少苦头，但对它也仍然有些幻想，觉得我們国家应当励精图治，大力进行經濟建設，何必惹是生非，多耗軍費，影响建設，何况美国将来对我国建設或許有所帮助。不久，中国人民志願軍过了鴨綠江，捷报频傳，把美国侵略軍从鴨綠江边赶到“三八”线，我才感到新中国如今确实是大不相同了，我們祖国确实站起来了。百年来常受外人欺侮压迫的民族，居然打败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一偉大胜利，激发了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的热情。就在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的那一天，我热情地参加了游行，擎着大旗，迎着大风，从南京路外灘一直坚持到西藏路人民公园。这是我生平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以后我又积极投入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同全国人民一起，支持中国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神圣斗争。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工商界出現了不少問題，偷工减料，偷稅漏稅等等不法行为都发生了。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稅漏稅，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盜窃国家資財，反对盜窃国家經濟情报的偉大的“五反”斗争。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認為这些不法行为确实不好，應該反掉。但是后来斗争到自己头上了，心里很不痛快，以为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靠攏党，做事也規規矩矩，沒有犯什么錯誤，为什么也要“反”？又怀疑政策是不是在改变？記得我当时还对一位朋友說：“今天的政府很有办法，只要国家能够兴盛，我們个人牺牲一点也算不了什么。”这意思就是，如果

政府真的不要我們這批資本家，只要國家強，個人如何也就不去考慮了。鬥爭終究是苦痛的，我一面又要檢查自己，一面又要安定各個企業負責人的情緒，精神上又緊張又苦悶。但經過“五反”運動之後，我倒很感謝這次運動了。因為，“五反”粉碎了我的“新民主主義萬歲”的念頭，使我認識到這種想法是及其危險的。在“五反”中揭發出來的許多具體事例，也使我認識到資本家的不良行為，如果不加以打擊，任其滋長下去的話，勢必會破壞國家建設，影響人民生活。因此，資本家只有老老實實地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對國家、對自己才有益處。

在消沉、苦悶中摸索道路

“五反”雖然反掉了我的舊的想法，但是新的思想却還沒有樹立起來，因此感覺到很苦悶，很消沉。經過“五反”運動之後，國家和人民還是把我們當做一家人，信任我們，在那一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擴大會議，路過蘇聯時，還親身感受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我以後還被選為全國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然而，我們資本家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出路究竟何在呢？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子里縈回着。

在苦悶當中，為使這些問題求得解答，我想需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中去找找看，因此在這一時期中，我就埋頭自學。我看了“共產黨宣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寧主義基礎”和毛主席的著作等等，閱讀了這些經典著作，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我思想上的問題，但也啟發了我對於立場、觀點的一些認識，並且對我以後的工作很有幫助。

前途究竟如何？那还是在总路綫提出以后才明确的。1953年7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議，討論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綫，提出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針，指出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道路就是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形式。接着，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又深入地討論了私营工商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中如何發揮积极作用的問題，使我对本身的地位、前途和具体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这在我真有說不出的开心。在政协常委会上，我发言說：“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大勢所趨’，而且更是‘人心所向’，这个‘人心’同样包括了我們工商界的心。”道路的明确給我以莫大的鼓舞，但回想起来，說得更深刻些，那时个人的思想感情還沒有完全同社会主义結合起來，这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還沒有完全剝开資本主义丑惡的一面来看一看，還沒有去正視剝削的事实。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8月，申新系統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各厂的全体职工和資方都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来欢庆这件大喜事。政府派了公方代表与私方代表共同組成了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职工們热情更高，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則下，組織力量，清点了企业的全部财产，清出了許多过去我們不清楚的財产，并公平合理地核定了私股股金。对原有私方实职人員，都根据各人的能力和資历，进行了适当的安排，我仍担任了公私合营申新棉紡織印染厂总管理处總經理的职务。企业合营后，无数的事实使我更加認識到社会主义經營管理的优越性。象

申新九厂在合营之后，棉紗的制造成本就比合营以前降低了15%；棉布的次品率也从20%降低到1%——2%左右。

1955年10月間，在全国工商联召开执委会會議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主持座谈会，恳切地向我們講了一、兩個鐘头的話。毛主席要我們把眼光放远一点，認識社会发展規律，要我們不要怕共产，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指出我們的前途，說我們將來一定可以参加工人阶级的队伍。这对我來說，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听了毛主席的話，我回顧了荣家发家的历史，我的父亲和伯父，夢想办工业，救国图强，但帝国主义压迫我們，加上連年内战，我們的企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父亲一輩曾經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身上，可是蒋介石上台的第一着却是无端通緝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詐了10万銀元。1934年，申新系統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以时值三、四千万元的財产抵押給中国銀行和上海銀行，簽訂了借款500万元的合同，不料只付了280万元，宋子文就暗示銀行停止繼續付款，存心想乘机挤垮申新系統企业，攬为已有。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淞滬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分子还把我70岁的老父綁去40多天，勒索了几十万美元，还要給“破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更多的酬劳。我自己从1937年以来經營企业也一直在风雨飄搖之中。我也回顧了解放前一般資本家的慘淡遭遇，同业間互相傾軋排擠，帝国主义的傾銷競爭，再加上資產阶级的子弟吃喝玩乐，揮霍浪費，最后弄得傾家蕩產。“富不出三代”，几乎已成为資產阶级家庭兴亡的規律，我們申新系統在上海的五个厂，就有四个是人家办不下去而卖給我們的。在过去，誰也掌握不了命运，真是一句扣人

心弦的話。今天又如何呢？我今天不仅在企业里有地位，有职有权，生活有保障，还代表了民族資产阶级参加了国家的政权，受到了国家的重視和信任，真正可以好好地做一番事业。我的子女，也得到国家的培养和教育，将来都有工作可做，在新道德、新风气影响下，只要他們好好替国家做事，他們的前途用不着我耽心。听到毛主席的話，我更認識到人是可以变的，过去是、現在是个資本家，不远的將來，我一定可以变成一个劳动者。因此，我坚定地舍弃了“一人发财，众人倒霉”的剥削道路，真正把思想感情同社会主义結合在一起。

毛主席的講話，在上海广泛傳达之后，上海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大合营的高潮。在这高潮当中，我們全家也同整个上海一样欢腾起来了，連孩子們也卷进了这个热潮。他們都盼望早些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真是一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偉大的潮流！

1956年，共产党和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我們前进的方向，为我们安排好进一步改造的环境。中共“八大”文件中又对民族資产阶级作出确切的評价，提出了对今后改造的方針。在全国工商联會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毛主席又邀集各地工商联負責人进行座談。毛主席肯定了我們一年来的进步，說：“我們之間更熟悉了，更加靠攏了。”毛主席并且教导我們进一步发揚爱国主义精神，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我們是多么大的鼓舞。这句話的份量可不輕，更加強了我的自我改造的决心。

堅決向劳动者过渡

过去一向厌恶政治的我，在解放之后先后参加全国和上

海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工商联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工作以来，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偉大和正确。今天完全可以肯定，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問題在于我如何把自己棉薄的力量貢獻給国家，为国家一天天更繁荣、更富强而努力。我20年前开始做資本家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今天我会走上劳动者的道路。而事实上，今天我正同全国工商界一道，在自觉地、逐步地向劳动者过渡。

記得我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曾經引过“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話，来表达自己要坚决改造成一个劳动者的决心。我說：“‘共产党宣言’曾講到：‘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統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來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阶级。…… 現在也有一部分資产阶级分子轉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經进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資产者思想家。’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级虽然不是統治阶级，但是人的本質可以改变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或許我是一个資产阶级分子，因此特別喜欢这一段話。这段話鼓励了我接受改造的信心，当然也使我認識到改造的不易，要經過一番深刻艰苦的斗争的。”現在我正在按照这条道路走，我自己深信一定能够改造过来，而在不久的将来投入光荣的工人阶级的行列，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同志。

党与政府教导，鼓励我前进

郭 珮 爽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我們国家長期处于半殖民地的貧困落后的境地。我的上一輩在国外經商，和其他侨胞一样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因此，热望祖国能够强盛起来。当时曾满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心情归国創業。先后于 1918 年在上海开设永安公司，1921 年創办了永安紗厂，幻想着对国家尽些力量，进行实业救国。可是成不成呢？干脆地說：这是不成的。因为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殘和压迫，要想实业救国，那是不可能的。在旧中国，我們永安系統的企业同許多民族工商业一样經历着悲慘的命运。如永安紗厂在 1929 年和 1936 年先后遭受到英國、日本棉紗傾銷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經濟危机的影响，使我們面临崩潰的边缘。在抗日战争时期，永安紗厂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躪，机器、物料、紗錠受到严重的破坏。永安公司在过去曾向英美注册，希望得到保护，可是这是妄想，在上海淪陷时正因为永安公司挂了美商注册的招牌，反而遭到更大的損失；日本侵略者派駐了监督官来管理企业，把公司的全部現金劫走了。我們單从被侵略者掠夺去的棉花、棉紗、布匹、肥皂等等物資計算，估計損失达 24 万兩黃金之多。日本

侵略者还在永安公司屋頂花園花盆里故意放置炸彈突然爆炸，把我們周圍封鎖了 24 天，又強占企业在閘北區的全部房地產，這些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抗戰勝利後，又因受到美國剩餘物資大量傾銷的影響，使我們新建的永安大樓原來準備開設國貨商場的計劃也无法實現。上海解放前夕，由於偽金圓券的貶值，我們的損失總值等於 4 萬兩黃金，喪盡了我們的元氣。這都說明了处在舊社會里的民族工商業者，是透不過一口氣的，在那時維持企業已非常困難，更休論實業救國了。

二

帝國主義者向半殖民地舊中國大量輸出商品，使永安公司不得不長期推銷舶來品，這樣，也就助長了外國貨的傾銷。那時為了获取利潤，永安公司希望自己的企業象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所以除經營環球百貨商場外，還兼營其他附屬事業：酒樓、茶室、咖啡室、旅館、戲院、彈子房、溜冰場、跳舞場和游樂場等，這些附屬事業大部分是為一些享樂至上的寄生階級服務的。

在同行競爭中大家相互不擇手段，甚至我的亲戚、同鄉所開設在舊上海大馬路（即現在的南京東路）上的新新、先施、大新公司等，也都要在背地裏派人暗中調查商品價錢，互相削價傾銷，並用大減價、大賤賣作虛偽号召，爭奪營業，還要挖用女售貨員相互標榜。我們更漠視職工的生活，在每年大年夜那天，隨便解雇職工，那時職工的職業是毫無保障的。此外，我們還把永安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流通，買進賣出，企圖通過投

机賺些鈔票，但是被官僚資本操縱了，一时漲停板，一时又跌停板，連我們自己也控制不住，賺錢的希望自然落空了。

我在解放前听到“共产”兩字，的确也有些畏惧，以为共产党来了，产业要“共光”，資本家是没有前途的。上海解放前夕，我的上一輩也會為我預備飛機，要我到香港去，但是我沒有去。我不肯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家族觀念很深，我是郭家門里第二代的第一个老大，應該留在上海負責維持有“傳統性”的企业，而且上海是在我的祖国里，所以我堅決不走。

永安公司既是在半殖民地旧中国生長的，它的經營管理方式必然是資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一套，盲目競爭，追逐利潤，你爭我奪，唯利是圖。解放以后，这些腐朽落后狀態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同时正因为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当时发生了很多困难，如機構臃腫，开支龐大，收支不平衡等等。面对着這些問題，我覺得很傷腦筋。我对新社會認識不够，常用旧眼光看新事物，錯誤地認為国营中国百貨公司上海市公司在永安大楼开幕会影响我們公司的营业，居然在統戰會議上要求上級明确指示，国营百貨公司究竟还要开多少間。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情緒，各種會議很少參加；那时我虽然有些懂得国營經濟的領導作用，但当我看到大新、新新、先施三大公司結束时，思想很波动，心想：不知道我們永安公司的前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綫总任务頒布后，我开始糾正了以往的錯誤思想，消除了不必要的顧慮。那时永安公司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下，与国营企业建立了批購关系，我通过学习和感受，思想認識逐步地有所提高，認識到只有为接受改造准备

条件，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在职工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努力下，永安公司作了一些改革改造工作，结束了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附属事业，在经营管理上也作了若干改进。尤其是自1955年3月份开始与国营公司建立了经销代销关系以后，营业情况更见好转。但是改进企业工作做得还不够，尚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性质还没有根本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改造企业和改造自己，我们在1955年11月21日申请公私合营，第二天获得批准，从此永安公司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永安公司是在上海市工商业全行业合营以前第一批进入公私合营的，22日这一天，正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告全国工商界书”等文件发表的日子，我阅读了文件更加兴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的行动及时地符合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我在庆祝永安公司合营大会上无比愉快地说：“我已经乘上了社会主义的列车，一定要乘到儿孙幸福的站头。”

永安公司合营前夕，国营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在一夜天里给我们运来了1,000多种商品，价值36万元。国营企业的职工同志们十分热情地支持和鼓舞我们。在批准合营后的10天比前10天营业额就上升了30%，以后营业更是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这是广大消费者把我们看成了国营商业的助手，使这个新生的企业真正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永安公司自从合营以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信任我们全体私方人员，安排我们参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职工们发挥了积极性，提高了服务质量。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延长营业时间，繁荣上海夜市；在花色品种

上达到 33,000 种，比合营前增加了 175%，商品库存量增加了 5 倍以上；1956 年的全年营业额比 1955 年增加了 193% 以上，最高一天的营业额达 128,000 元。在合营仅三个多月，就已扭转了 8 年来长期亏损的局面，由保本到逐月盈余。合营的第一年就盈余 50 多万元。现在永安公司货源充沛，已经成为一家公私合营的综合性的百货商店。针棉织品、日用百货、文具、纸张、电器、五金、新药、南北货、呢绒布匹、家具、钟表、服装、水果、糕饼等 35 个营业部门的商品把所有的货厨货架都摆得满满的，这是永安公司 30 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1956 年我们建立了进货、销货和库存等一系列的经营管理制度。同许多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订立了结算协议书，扩大和改进了原来的邮售服务，电话送货，送货收款等方法，服务对象不仅在于上海，而且遍及新疆、西藏、黑龙江、海南岛等边远地区。

当企业合营批准后，我觉得千斤重担放下了，职工工资和个人薪金固定可得，企业经济没有困难。但在合营初期还有些耽心，不知道清产核资下来有多少私股？股息又怎样？清产的结果，永安公司资产还是 750 万元，这与 1952 年重估财产时的产值相等。公司亏蚀了许多年，现在我们对股东还好交代，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政府宣布定息 5 厘，这真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我衷心地表示拥护和万分感谢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我相信政府关于定息的这一贤明措施，必定会获得国内外华侨的热烈拥护，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从而更为踊跃地投资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我会写信给国外华侨股东说：“我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您们报道

永安公司的喜訊，我公司深受人民政府的扶植，公私合營以來，營業驟升，已迅速扭轉了虧損，轉為略有盈余，永安公司清產核資後的淨值仍與原來的股本750萬元相等，定年息5厘，股東有息可收”。

永安公司合營後，黨對企業的領導工作有了加強，使我們完全能够根據政策辦事。例如：在人事安排上，對私方人員是就原有工作職位來作適當安排，我們提升了一些具有政治水準、業務經驗的職工擔任科室和小組的領導工作。

公方代表和私方建立了經理碰頭會議制度，每周開三次，凡是有關企業的重大問題，如提升干部、調整營業部門的勞動力、實行分班制、安排工時以及職工福利等，都在碰頭會上進行協商，大家開誠相見，說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經過認真研究，意見統一後，才作出決定貫徹下去。這樣使我們私方人員感到有職有權。此外，還定期在每星期三舉行科長例會，各科匯報業務工作情況，同時對於應興應革事宜，大家也鑽研討論；討論中，如有不同的見解，大家都能夠聽取對方的更好的意見，修正自己的看法，妥善地把每一個問題得出合理的結論，保證搞好工作。因此，密切了公私關係，真正地做到溝通思想、相互幫助。

我們在布置季度商品流轉計劃和工作總結時，領導經常深入小組；並且行政與工會結合在一起召開組長和職工大會，充分發揚民主，聽取群眾的意見，採納合理化建議。如業務科將采購組下放到商場科，使采購人員與商場營業部門直接取得聯繫，減少層次。從1956年4月份起精簡管理部門編制，陸續抽調人員至商場。我們不斷地發掘企業潛在力量，改

进企业的經營管理工作。我們对于职工的福利問題，办得到的馬上就办，一时难以办到的，向职工进行解釋。

在各种會議上，公方副經理一貫抱着謙虛誠恳的态度，他很尊重行政制度和行政上的权限，使我能够安排時間，做到生产經營与社会活動兩相兼顾，并且总是讓我主持會議。对于上級领导机关召集的有关业务、行政方面的會議，公方代表也都讓我們私方人員一道参加，这不但使私方人員更好地了解政策，而且对社会主义經營知識也有所提高。

公方代表与我們私方人員不仅在工作关系上搞得很好，而且公私双方在学习上也配合得很好。如公私双方一道編組学习“八大”文件以后，我們就結合实际改进各項領導工作，如精簡會議、提高會議質量等。公私双方在相互友愛上也表現得很好，公方代表和职工會到我家里举行春节联欢，工会举办的时事、科技講座都經常邀請我們私方人員参加听講。在文娱活动方面，象工会搞的联欢会、郊游活动等，都邀請我們共同联欢。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职工們协助私方做出成績，使大部分私方人員連續評上了獎。我曾經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公私关系座谈会上这样說：“我們的團結，与公方是公私不分，与职工是同一陣線”。这說明我們公私关系是很融洽的。

永安公司在私营时期原有职工 1,146 人，因为那时企业經營管理不善，营业情况不佳，劳动力有过剩現象。合营以后，营业大大发展，获得上級的支持，还增添了青年职工 234 人。全体职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創造性，在去年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組織訪問工作队了解消費

者的需要，并分批到国营商店去学习招待顧客、推銷商品的方法。因此在服务态度上有了显著改善。我們推行了商品定位定量，建立了永續盤存制，之后又推行数量金额核算制和小组营业责任制，使差错事故有了减少。在增产节约方面，1956年的費用平均只占营业额的 8.11%，較合营前降低了近兩倍。今后我們还要繼續大力开展增产节约。

总之，企业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經營管理制度的优越性；而党和政府的加强领导，公私双方共事关系好，以及职工群众的努力，这是永安公司合营以后所以取得以上初步收获的主要因素。

三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自从 1955 年实现对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在国际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彪炳寰宇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逐步赎买的政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这种政策，受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赞扬，其他一些国家的各阶层人士也很感兴趣，因而许多国家组成了代表团接踵来到我国考察访问。永安公司在国际上稍具薄誉，来访的各国人士不少，我由于工作关系，荣幸地招待了许多外宾和海外侨胞。例如有不少苏联专家和记者，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记者要我谈一些作为一个资本家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靠拢共产党，以及如何能够抱着很愉快的心情愿意放弃剥削的问题。我所谈的一些情况，苏联星火杂志和一些报纸，用着很多篇幅刊载了。

記得有一次，在巴黎出版的“國際展望”上登載了題為“中國資本家郭琳爽”的文章，內容是：從我上輩歸國創業的遭遇起，直到解放後我怎樣通過一系列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事物的生動教育和六年來政府怎樣关怀、培养我，等等。有位法國共產黨書記來到中國，也到永安公司訪問，我和他談了話。在開始談話時，他希望我多談實際情況，少說理論，所以我沒有講大道理。當時我講的是企業合營前的困難情況，及合營後的許多收穫和新鮮事例，如營業數字不斷提高、商品品種的增加和職工服務態度的改進等等；也談了個人在思想意識上接受改造的經過。在結束談話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一句理論的話，那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公私合營，體現了社會主義經營管理制度的優越性”。這位書記同志由衷地表示同意，而笑了起來，並祝我們前途光明，不斷進步。

又如：緬甸和平代表團聽了我講國家對我們的企業加強了領導和管理，使廣大消費者把我們看成國營商業的助手，真正能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他們對於企業合營公私雙方所簽訂的合約，特別重視，要我把內容翻譯一下，逐項仔細地記錄下來。團長還說：“回國以後，要向國會提出建議，也要學習我們這樣來做”。這證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人士，對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感到莫大興趣。因此，我們不仅要把自己的才能貢獻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且要進一步聯繫實際介紹經驗，使外國工商界朋友，更加正確了解我國和平改造的政策和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

我还招待了来自印度尼西亞、突尼斯、以色列、加拿大、挪威等国来我国訪問的人們，他們都感到人民中国到处都充滿

着幸福的气氛。但是他們对于中國資本家为什么肯放弃生产資料覺得惊奇。我向他們解釋說：“在旧社会大家以为資本家有了生产資料就可以多做买卖，能够多賺錢。总以为錢多了勢力也大了，儿女們也不用愁生活了。其实不然，在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資本家，不但动荡不定、錢多了怕綁票，还要遭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殘，自己也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今天的新中国，物价稳定，資本家生活过得很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顧，都能够安居乐业，孩子長大以后，国家会替他們安排工作。因此生長在我們新中国的青年，再也不要繼承剝削可耻的遗产，也不要做資本家了，肯定將來还会享受到比現在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为了热爱祖国，我更應該要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密切的結合起來，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所以我极愿意脱离生产資料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客人們听了我这番話，都頻頻点头。有的問我：企业在沒有公私合营前的情况怎样？我說：过去由于經營管理制度的腐朽，以致困难重重，每天总是愁眉苦臉的回家，爱人看到我也是愁眉苦臉。合营后可不同了！資金周轉灵活，貨源充沛，不但工資和国家稅收能按时繳付，而且还有盈余。国家还給我們定息。現在我每天回到家里，我夫妇倆内心就覺得无比的愉快。一位挪威女朋友很理解我的心情，她說：“我有个女婿在挪威开设商店，碰到困难时，常常唉声叹气。如果我的女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那就不会叹气了。”从外宾的談話中，我体会到目前尚生活在資本主义国家里的工商界人士的不幸遭遇，根本和我們幸福的感受迥不相同；同时我也認識了世界兩個

制度的和平竞赛，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社会主义。

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朋友过去听说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到了新中国看到庙宇教堂以后，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基督教徒，每个星期都到教堂里去做礼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信仰宗教的客人听了感到非常满意。

我在多次招待日本外宾时，他们谈到日本大小商店之间相互竞争的风气甚熾，问我有没有竞争？我说：“在我们国家里，人民政府贯彻了统筹兼顾、合理调整商业网的政策，我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我们现在是相互之间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而不是‘彼此争夺营业’了。”他们感到钦佩而富有兴趣。还有许多外宾到我家里，看到我在花园里种植花卉、饲养小鸡。另外有一次，我在杭州碰到几位印度国会议员，他们怀着好奇心问我：你也有机会来杭州游山玩水吗？我说我每年至少有一个星期来杭州西湖游览休息的。外宾们看到这些事实，更相信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是真正愉快的。

我还招待过很多海外华侨。有些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侨胞，他们在未来祖国之前，认为祖国的资本家会心甘意愿自己申请公私合营是一个奇迹。访问后有些人回到新加坡时，给“星州日报”写文章，介绍我们和平改造的情况。文章谈到：永安公司公私合营是很顺利进行的，这非凡的成就不由令人惊奇。现在国家和资本家共同参加企业管理，而资本家有一定的定息。政府与人民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家是采取适当的讲理和有步骤的解决问题，这种办法使人信服，大家都乐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1956年12月我出席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有位政府领导人启发我们私方人员写一个新的座右铭，随时警惕自己，不要放松。我觉得很对，就根据会议讨论五项准则时谈到的一些内容，写了28个字的座右铭：一靠二学三重视，四近公方五服从；六戒骄奢七尽责，八勤九爱十防松。意思是：依靠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重视职工群众的意见，接近公方主动搞好公私关系，服从上级领导，勤俭办企业，爱护社会主义企业，最后是防止松劲思想。这就是我最近的認識和努力的方向。由于党与政府的教导，鼓励我进步，今后，我还應該繼續加紧学习政治理論，提高思想認識，与全国人民一起向着美好幸福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一条心，一条路

孙 照 明

生活在这个偉大的历史时代，每一个人都亲眼看到了周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們的国家結束了長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的国家。全国人民都在为最后消灭剥削与貧困，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我們民族工商业者几年来由于事实的教育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看清了方向，坚决地選擇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願意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設社会主义。当然，由于我們过去所处的經濟地位，思想的发展不免是迂回曲折的。現在讓我結合过去的情况，來談談我所經營的企业和个人的变化。

“协大祥”、“三大祥”

上海綢布业的“三大祥”，以“协大祥”創始最早。距今45年前，我的父亲与合伙人集資1万兩白銀，在上海小东門开设了“协大祥”。时当清末民初，外国商品通过上海大量輸入我国，所謂十里洋場，实际是洋貨傾銷的市場。那时“协大祥”所經營的布匹有80%是洋布，国产布匹只不过20%左右，所以招牌称做“洋布庄”，与后来的“綢布庄”有一字之差。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旧中国商业的性質，它是为外国商品傾銷而服务的，

它給外國資本家裝滿了口袋，自己則从中分其余瀝。

小東門原來是魚類和菜場的集散地，外埠輪船大多停靠在這一帶，本幫和客幫辦貨集中在这里，真是萬商云集。“協大祥”選在這個好地段，經銷的洋布又是暗門，利潤極厚，因此年年獲利，月月賺錢。10多年後，資本就積累到10多萬兩白銀，成為同行中的巨擘。在旧社會里合伙开店，各有各的算盤，股東們看到錢賺多了，就鬧意見，一部分股東拆出，在“協大祥”隔壁開設了“寶大祥”；之後，又有一部分股東開設了“信大祥”，各自憑借雄厚的資金，相互競爭。從此小東門一帶興起了“三大祥”的市面。抗戰時期，市民集中在上海英、法兩租界，“三大祥”又逐步伸張到市中心區，在八仙橋和南京路開設了支店。

競爭與排擠

“協大祥”為了拉攏顧客，首創“足尺加一”的辦法。自从“寶大祥”一開，競爭便劇烈起來了，從“足尺加二”攬到“足尺加三”，造成了以後幾十年來全市甚至各地同行的放尺陋規，直到解放以後才廢除。其實所謂加一加三，都不過驅驅顧客罢了，就以當時的熱門貨日本玄色直貢呢來說，進價每尺一角五分，足尺加三，成本還不到兩角，而賣價統扯每尺二角五、六分左右，仍有五分錢的利潤。羊毛原是出在羊身上（那時“協大祥”平均每天賣出直貢呢40多匹，淨賺白銀100兩，僅此一項，足夠开支有余）。那時除用“放尺”的辦法來拉攏顧客外，還有許多新花樣，例如：周年大減價、特別大放盤、廉價品、犧牲品以及贈券、摸彩等等，同行相互效尤，蔚成一時風氣。

“协”、“宝”两家竞争愈烈，赚钱愈多，倒楣的是小同行。他们资金短，花色少，经不起这种竞争排挤的风浪，便一家家倒闭了。小东门一带五、六家同业，有五家相继歇业；后来“三大祥”发展到市中心区的时候，金陵路一带的同业也受到了这种竞争风浪的袭击，他们有的门庭冷落，有的歇业，有的奄奄一息，无法维持。过去，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资本主义盲目竞争的法则，只知道自己多做生意多赚钱，不管同业的死活。解放后通过学习，才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业之间必然是相互排挤，盲目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也就是个人发财、众人倒楣的道理。“三大祥”的成长与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壟斷与投机

我16岁到“协大祥”，跟父亲学业，19岁满师。当时所看到和学到的，无非是种种欺骗顾客的手段和排挤同业的方法。20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当上了“协大祥”经理，为的是克绍箕裘，光大父业。这时资金已积累到六、七十万元，一部分股东要求拆股，仅“协大祥”这块招牌，就作价128,000两白银。我年事虽轻，却怀着自己的“抱负”，要在同业中出奇制胜，独占上风，不但垄断销货，还想垄断进货。我父亲在世时，已向个别染织厂投资，到我手里，范围更加扩大，有好几家染织厂，“协大祥”都占了大股，这些厂出产的布匹，大部分由“协大祥”包销；新的花色品种尽先供给“协大祥”，要多少是多少。“协大祥”又用定货方式向工厂进货，或利用五荒六月，向有困难的小厂低价进货，把各厂生产的大部分布匹抓在手里，低价卖进，高价

卖出。到抗战时期，又陆续投资开设了七、八家银行钱庄，自己担任董事長、常务董事等等职务，以便调用资金，控制物资。

“宝大祥”当然不肯放松，他们也垄断了几种布匹，独占利润；又在小东门一带开设支店，有所谓西号、南号等等，对“协大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于是，竞争的花样便发展到房屋方面来了。我首先设法把“宝大祥南号”的房屋向原主挖下两间，开设“协大祥新号”，弄得“宝大祥”原来是五开间门面的招牌不得不砍掉一段，只剩下五分之三。当支店发展到市中心区以后，我又用重价把“宝大祥”八仙桥支店侧面的房屋拿下，使它的店面无法扩展。从此两家仇恨愈深，股东成陌路，同行变冤家。直到解放以后，我们才消除了这种盲目竞争的现象，真正言归于好，重新团结起来。

不能掌握命运

我这样费尽心机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以为是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敌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大肆掠夺，强迫收买纱布，全行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我们几家大户损失尤重，“协大祥”一家就损失棉布3万匹，约值现在的人民币90万元。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遭到“金圆券”之难，损失棉布3万匹，占当时企业全部资产的一半以上。我投资的几家工厂同样受到搜刮，如我负责的鼎新染织厂原有四、五万匹布，在“限价”时期几乎全部搞光，给“协大祥”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这两次大风大浪，几乎使我倾家荡产，至今想来，犹有余悸。从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在旧中国，

任何人都沒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血腥統治和殘酷掠奪，不仅使广大人民過着悲慘黑暗的日子，我們工商业者的命运也一直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在解放以後，我們民族工商业者才彻底擺脫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的壓榨，才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从动摇到安定

从解放前后到抗美援朝，中国发生了一連串天翻地复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我的思想上，可以說是从动摇到安定，从怀疑到信仰。事实是最好的教育：共产党来了，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我照旧經營“协大祥”，而且生意很好。共产党把民族資产阶级團結在統一戰線之内，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企业經營，都是协商了再办；企业內部的劳資矛盾，也是劳資双方协商解决。这样，解放前所听到的那些惡毒的謠言，很快地被鐵的事实粉碎了。

上海在“二六”轟炸以后，市面一度不正常，部分工厂生产发生困难，当时便有人說：“共产党政治上有本領，恐怕經濟上沒办法”。当时我也有这种看法。我經營的鼎新染織厂，在“金圓券”时期已全部搞光，几年来靠借貸周轉，市面一停頓，貨色卖不出去，工厂便发生了困难，織、染兩厂 800 多工人瀕于停伙。我是工厂負責人，除了从“协大祥”搬些錢去临时应付外，一时想不出办法，便一溜烟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 3 个多月，看到首都市面繁榮，政府工作人員都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与国民党統治时期截然不同，使人自然地感到有一种新鮮的朝气。3 个月后我回到上海，还是怕工厂困难，不敢去过問，可

是厂里的情况竟使我大吃一惊，由于政府的贷款加工，帮助維持，原料也有了，資金也有了，存貨也有了，而且比过去大大活絡了。仅仅 3 个月，就变化得这么快，这么大，使我不能不相信：共产党不仅政治上有本領，經濟上同样有办法。

抗美援朝运动剛开始，我心里有些怀疑：“这样年輕的政权，能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嗎？”可是事实証明，我們不仅对付得过，而且赢得了偉大的胜利。中国是長时期来受尽屈辱的国家，反动派碰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是叩头哈腰，就是望风披靡。共产党领导中国不到兩年，竟能創造这样的丰功偉績，給 6 亿人民揚眉吐气，我自己也觉得昂然地站了起来，就这样我安定下来。

积 极 經 营

安定下来以后，我便專心經營“协大祥”，因为看到政府这样的对待我們，自己觉得只有搞好企业的經營管理，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貢献，也才真正称得上一个中国的民族工商業者。1950 年初暫时发生的經濟困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領導下迅速地克服了，市面正常，物价平稳，各行各业呈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以“协大祥”來說，也出現了新的情况，首先經營的商品在变化，解放前还有 30—40% 是洋布，这时国产布匹已占 90 %以上，逐步地走向为国内的生产、消費而服务；其次經營的作风在变化，几十年来相沿成习的放任頗規和其它虛伪欺騙的作风廢除了，貨真价实的风气逐步建立起来了；同时企业内部的管理也起了显著的变化，过去的所謂管理，實質上无非是限制和剝削职工。“协大祥”是几十年的

老店，年复一年地积累了許多剝削职工的經驗，所訂店規多至160余条，其中有所謂“晨起獎”、“作輶獎”、“对复賬獎”、“升工”，等等名目，名为獎励，实际是加重职工的劳动强度，延長职工的劳动時間，并限制职工的活動。职工触犯店規的，店里不用說明理由，可以任意解雇。一年三节，职工比做“过三关”，耽心賬房間貼出紅紙條歇生意。这种不合乎情理的老店規，通过劳資协商逐步加以修改或廢除了，劳資之間逐步建立起民主、平等、兩利的关系，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我自己的生活也在变化，过去我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人家称我“小开”、“袂褲子”，而現在則經常到店，关心企业的經營管理，并參加社会活動和組織領導的学习，生活一天天正常，思想也一天天开朗了。

这些情况，說明企业和个人在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其所以如此，應該感謝共产党和政府的教育，感謝职工的帮助与組織的培养；特別是偉大的“五反”运动，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从此我在思想上認清了过去那种骯髒丑惡的东西，从而为拥护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 照 顧 小

1954年秋季，国家实行棉布計劃供应，全市棉布店納入国家資本主义軌道，与国营商业建立經銷关系。在这以前，棉布业与国营商业已建立了批購关系，在貨源分配問題上，我曾經思想波动。当时，自由市場已經消失了，国营商业分配貨源，一般照顧小戶、困难戶。我的看法是：小戶关下来，影响不大，如果大戶不能維持，將影响到数百职工的生活，認為政

府的措施好象是顧此失彼，因小忘大。其实，当时“协大祥”的业务还是高于一般同业的，我只是从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看問題罢了。政府首長說：“社会主义要人人好，不是一个人好；要全行业好，不是一个企业好。目前中小戶有困难，應該从大照顧小、从帮助困难戶出发，使大家都能維持下来。”这話給我很大的帮助。我把兩种社会对比一下，从前是大吃小，而現在則是大照顧小。認識了这个道理，心情就覺得很自然，願意帮助同业，使大家得到維持。

解放以前，“协大祥”依靠某些布匹的独占利潤，生意大，开支大，自以为大来大去，滿不在乎，无形中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开支比一般同业要高出 30%。我分析了这些原因，便着手研究改善經營管理的方案，并把它提出来与职工协商，果然得到职工的全力支持，順利达成協議。新方案实行后，每月开支从 8 万元降至 63,000 元，其中仅另剪損耗一項，就从原来的1% 减低到 0.57%，以全年营业额計算，无形中节约財富 10 多万元。由此体会到：政府政策不仅为照顧小戶、困难戶，同时更有着促进改善經營管理的积极意义，使我們注意到精打細算，减少浪费，为国家节约財富，积累資金。这里还應該提到，由于同业体会这一精神，不再盲目竞争，全业真正团结起来了。几十年的老冤家“协大祥”和“宝大祥”重归于好，在研究改善經營管理时交流經驗，开誠相見，取長补短，共同提高。

大胜利与大喜事

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是工人阶级的大胜利，也是我們工商业者的大喜事。

我們棉布业全业公私合營，是在高潮以前。那时，北京市棉布业已經批准公私合營，同业听到这个消息，紛紛到同业公会詢問，他們說：“上海棉布业第一个挂出經銷牌子，这是全业的光荣。現在北京同业又走前了一步，我們几时才能爭取到公私合營呢？”我是同业公会主任委員，自己对公私合營早已有著迫切的期望，听到同业們这样反映，更覺得全业公私合營的时机已經成熟，刻不容緩。因此，同行业的骨干仔細研究，向政府提出了全业改造的方案。当这个方案得到政府同意的那天，全市 349 家棉布店的全体資方，分別集中在各个地区，立等好音；仅在兩個半小时以內，全体同业自願的办好申請手續，由同业公会汇送政府，得到政府正式批准。

公私合營是从資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步驟。工人阶级以消灭剥削、建立沒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他們对于公私合營当然是热烈欢迎的。我們工商业者本身是剥削者、生产資料的私有者，为什么也把公私合營看做大喜事呢？以我自己的体会，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几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使我們真正認識到剥削的可耻和資本主义的腐朽落后。解放以前，不論大小同业，一般都亲身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过程，自己昧心剥削得来的錢，不是落入大魚之口，就是落入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家之腹。資本主义是一条死路，誰还願意走死路呢？第二，中国并不是首創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幸福生活，已給我們作出了榜样。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个人好，而且人人好；不仅自身好，而且子孙好。我們过去經營工商业，既为自身打算，亦为自己的子孙打算，但子孙如果不好，

錢多仍然一場空。現在自身乃至子孫万代的幸福都有保障，我們怎能不向往社会主义呢！第三，政府和平改造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深入人心，它既保障我們的生活，安排我們的工作；又給我們指出了前途，讓我們同全国人民一道，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共同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民族資产阶级为什么以敲鑼打鼓、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公私合營高潮的道理。

棉布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久，就解决了过去同业中所存在的沒法解决的問題。例如：合营前全市棉布店的分布網不合理，資金、劳动力和业务不平衡，那时同业公会虽然作出了調整的规划，但因生产資料私有制的限制，无法实行。合营以后，全企业的分布網逐步得到了調整，資金和劳动力全面规划、統一調配，既有利于供应消费者的需要，也有利于业务的发展，全企业营业额比合营前增加了30%。

踏上新崗位

棉布业全业合营以后，805个私方人員都得到了妥善安排，我自己被安排为国营专业公司零售业务部副經理。一个資本家当上国营企业的领导干部，这时的心情是很难描繪的，正如俗話所說，一則以喜，一則以忧。自己思忖：过去經營“協大祥”，連劳資双方在內不过348人，現在却要去领导全市349家同业；过去的企业是資本主义性質，而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質。企业的性質不同，工作的內容和方式方法都不同，这就使我感到茫无头緒，耽心搞不了。但是，我参加工作以后，公方代表处处給我支持和帮助，甚至对生活細节亦关心备至，

使我一点不感到陌生。公方代表指示我：工作要由粗到細，從簡單的工作做起，逐漸做到細致。要由生到熟，仔細研究內部文件和行業資料，就能逐步摸清情況。我們私方人員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有利條件，如平時與同業接觸頻繁，行業中存在哪些問題，心裡大致有數；過去長時期經營企業，業務比較熟悉，也了解消費者和時令的需要。全行業雖然公私合營了，原來存在的問題不是一朝可以解決的，我們就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與公方領導研究，使它逐步解決和逐步改進。我從這幾方面着手，經過幾個月的琢磨，對新的工作也慢慢摸熟了。後來政府又把我提升為專業公司副經理，自己感到責任更加重大，但我打定了兩個主意：第一，要善于向公方學習，學習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和實事求是、依靠群眾的工作作風，以便在工作中增長學問，練出本領。第二，自己原有的一些經驗，要仔細加以區別，哪些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應該毫不保留地貢獻出來；哪些是沒用處、甚至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應該堅決地加以揚棄。我一定堅持不懈，加倍努力，來報答政府對我們的重視和培養。

西北參觀後的感受

1956年8月，我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組織的西北建設事業參觀團，亲眼看到了西北各地規模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但使我大開眼界，也使我的思想進一步開展了。解放以前，西北地區長時期受着反動統治的禍害，廣大人民過着悲慘黑暗的日子，素有“旁山惡水，地瘠民貧”之稱。可是解放仅仅7年，情況已完全改觀。那些原來是古老破

旧的一些城市，都已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了，工地上日夜开工，夜晚电炬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到处是：荒山成宝庫，平地起高楼。我参观过許多巨大的工厂，在厂里环繞一周，往往要費去几个小时，工程之大，非可想象。我也到过濁流滾滾的黃河岸边，看到三門峽水利樞紐，光是一个水庫就占地 300 万亩，宛如內海。当我亲眼看到这么偉大的建設工程以后，不禁产生了几个感想：第一，国民党統治中国数十年，除剝削掠夺外，沒有替人民做过一点好事，使人民的痛苦日深。而共产党領導人民掌握政权以后，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各种建設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我沿路所碰到的人們，都是衣冠整齐，兴奋愉快，回想到过去农村里小姑娘沒有衣褲穿的情况，正是一个鮮明的对照。第二，資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开工厂，筑鐵路，其目的是吮吸我們的膏血。而社会主义国家則根本不同，特別是苏联給我們大公无私的帮助，比之兄弟間的情誼更高貴，更純洁。我在西北地区的偉大建設中，亲眼看到了这点。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們的亲密合作，給予我們的真誠援助，与資本主义国家对我們的奴役掠夺，又是一个鮮明的对照。第三，我們工商业者过去是生产資料的私有者，是剝削者，資金只是被利用作为剝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的資金却全部用之于建設事业，为人民造福。再从数字看，中国民族資產阶级的全部資产不过 22 亿元，而国家对建設的投資，仅一个三門峽水利樞紐就达 16 亿元；如果把个人所有的資产来对比一下，更觉得渺如滄海一粟，有什么可貴。由此，我更进一步的热爱社会主义，願意放弃“小家私”，与全国人民共同来享受國家这一分“大家業”。

到西北參觀后，我另外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过去經營商业，只是为利潤出发，一手进，一手出，看不到它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作用。而現在就不同了。以西北的蘭州來說，近年因建設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而商业未能与之相适应，广大市民的生活受到一些影响。上海一批商店迁到那里以后，当地人民热烈欢迎，无不門庭若市，营业一般比在上海高出几倍，但还是供不应求。許多上海的老朋友到了西北，都起早落夜，积极工作，一点不感疲劳。他們說：一到西北，首先为偉大的建設事業所鼓舞，大家願意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們服务得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工作的积极性就格外高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提早成功。的确，這話是极有道理的，我們要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做好商业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环。我是从事商业的，从这里更加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要，也更加提高了工作的信心。

心向社会主义

解放 8 年来，随着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企业的变化，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正是千千万万工商业者所发生的变化。这就說明我們国家所采取的和平改造的政策，不仅能够改造社会，而且能够改造人。

上海市資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有人譬喻說，中国民族資产阶级的一只脚已經跨进了社会主义，另一只脚也非跨进去不可，这是大势所趋。以我自己的体会，不仅是一只脚，連一顆心也自然地跨进社会主义去了。我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同全国人民是一条心，走的是一条路。

始終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簡 日 林

我是怎样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对我來說，的确不是簡單的一回事。几年以前，我根本想不到、也无法理解这个問題。这几年来，我的思想轉变过程，真所謂“說來話長”，是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这先得从我个人兴趣說起。我生長在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家庭里，可是从小不大欢喜办工厂、做买卖。認為中国之所以比人家落后，是由于科学技术不如人，所以我選擇了工程作为我的專業。由于戰事的延續，我被阻留在国外很長一个时期。在这期間，我参加了若干工程工作，担任过繪圖員、設計員、工程师等职务，并且也成家立室。那时我虽然寄人籬下，到处被歧視和冷遇，但生活仍相當安定。抗战胜利后，知道我們家族中的先輩創立在上海的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已被官僚資本盤據。这个业企，是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們远在清朝末年——1905 年时創立的，开始时由于資金短缺和技术缺乏，失敗了好几次，直到民国成立后，由于海外侨胞受到爱国情緒的鼓舞，对国貨极为欢迎，业务才逐步好轉起来，而且得到不少发展。可是帝国主义者不願看見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惜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打击中伤，企图达到他們并吞的目的。几十年支撑过去了，可是已經筋疲力竭，被早

已在旁覬覦的宋子文，利用公司周轉不灵和人事不調的时机，用低价收买了一部分股票，乘机插足其中，而且長期地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支配大权。当时家中老的老了，小的太小，都寄望着我能够回来和人家爭一席之地。为了看看多年闊別的祖国，也为了不忍拂逆慈母和叔父的意願，我在 1946 年底回到上海。1947 年初，我进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担任了协理的职务。所謂“协理”，不过是一个空名罢了，以我一个剛从国外回來的年輕人，既无吹拍鑽营的本領，也无显达的亲友做靠山，凭什么和人家爭呢？企业內从總經理到各部門的負責人，几乎全是宋家的亲信爪牙，本来在公司服务多年的較为高級的职员，都一一被他們用种种办法挤走了。什么事我都管不着，管不了。我主管的是“計劃”，試問在那时有什么計劃呢？还不簡直是笑話！当时的社會，更是暗无天日，物价奔騰，国民党政府腐朽无能，貪污盛行。有时我想：我到底回来得对嗎？“祖国”，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1948 年，官僚資本眼見大势已去，便作有計劃的撤退，并有意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資產逐漸全部轉移到海外去。为了照顧家族的利益，我也隨着南迁，最后停留在香港。由于形势发展得极快，大陸各地相繼解放，官僚資本的亲信覺得香港也站不住了，于是在 1950 年逃的逃、跑的跑，各自远走高飞。

1950 年底，我終于在亲友的敦促下，从香港回到上海來协商企业改組和合營的事，那时我是抱着极大的顧慮回來的。大陸已經解放了一年多，人民政府把官僚資本家赶走了，把多年来压在我們企业头上的石头去掉了，这的确是大快人心的

事。但是我們又會怎樣呢？是不是也可能會被同樣對待？當時香港流傳着各種各樣的謠言，說什麼，共產黨來了，要“共產共妻”等等。我雖然不相信“共妻共產”的謠言，但總覺得共產黨是要打倒資本家的，作為一個資本家的身份回去，會對我怎樣？很多人都說國內如何如何困苦，是否今后只能過粗衣淡飯的刻苦生活，不能有一些享受和娛樂？但我想：別人說的總不能全信，我終於決定回來看一看。這不是說我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了什麼認識了，而只是為着家族的利益，同時也因為看到我的 70 多高齡的叔父——玉階先生，他不辭艱苦、冒着危險從香港秘密地乘坐貨輪到東北，還帶着多年未根除的攝護腺病症，衰齡弱體，也不畏長途跋涉几經輾轉才抵達北京，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這種愛國的舉動感動了我，同時他回國之後，屢次寫信告訴我國內種種欣欣向榮的情況。這促進了我回來看看的決心。

最初，也僅僅是抱着“看看”的心情回來的。我想：或許我仍改回本行搞些工程事務，或許在企業里干一個時期再說，甚至有這種想法，或許再出國去寄人籬下。事實是最好的証人，證明了我的一切顧慮都是多余的，沒有根據的。我回來不久，公私雙方就取得了融洽的協議，1951 年 2 月，企業順利地正式改組為公私合營企業。共產黨並沒有把我排擠掉，而是在信任我的基礎上給予我一定職權，任命我為總經理。

企業合營後很快地就出現了新氣象。“南洋”在解放前，已被官僚資本搞得僅具虛名，人事臃腫，業務衰退，工廠生產也是時斷時續。解放後軍管時期，得到政府很多的照顧與扶植，逐漸地扭轉了盲目經營和長期亏损的現象。合營後更因為有

了各方面的配合，得到了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門的关注，加上工人們积极劳动，很快从恢复到发展而欣欣向荣，出現了多年未有的景象。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也愉快地工作着，这不能不令我想起 1947 年初从外国回来时遭遇的境况，把它拿来对比一下，誰是友、誰是敵，也就涇渭分明，清楚不过了。尤其是国家在各方面建設的巨大成就，鼓舞着我們每一个人，祖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更令我們曾經長期旅居国外的人，深为感动。一句話：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我开始知道，我选择的道路是选对了。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合营比較早的企业，也是很早就体现了国家資本主义优越性的企业。但是合营初期，我还不能深刻理解国家資本主义优越性的本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好？为什么会和以前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會出現了這許多新气象？經過了总路線的学习，对于这些問題，才有了初步的認識。不过同时也引起了其他許多錯誤的思想，如“安于現狀”、“留恋現在”等等，覺得目前一切都很好了，不必再前进了。这实质上还是对社会主义認識不足，还是害怕社会主义对自己有所不利，害怕目前优裕的生活不能繼續維持下去，害怕有一天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我們这批人还有什么用，害怕改造的斗争太尖銳、太严厉会吃不消。忘記了在旧中国漫長的年代中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忘記了我的前輩在艰苦的年代中历受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忘記了这一切困苦的根源。

1955 年，我出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員会第二次會議时，听到了毛主席教导我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指示。

他的指示好象一盞明燈，指引着我們前进，也給我敲了警鐘，使我深深体会到“安于現狀”的危害性，也体会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很好地結合起来的道理。也就是說，只有認清社会发展規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几年来，我参加了一定的社会活动。除了自己的专业——卷烟工业——以外，我还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归国华侨联合会担任了一些具体工作，并且常常接待外宾和华侨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充实了自己，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使我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分子，是可爱的祖国中的一个公民，應該努力發揮积极的作用，才不負党的教育和培养。

1956年年底，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會員代表大会上听到了傳达毛主席的講話，同时听到了陈云、薄一波兩位副总理的报告，使我又一次受了很大的教育，深深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党是偉大的。政府对我们民族資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定息七年，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使我們能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大众一心，共同努力，为着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么？

最近政府又任命我为上海烟草工业公司經理，給予我的荣誉是太大了，使我感到又慚愧、又感动。更使我感触的是，今天我們办公的地方正是以前的“顧中”——英美烟公司——大楼。正是我现在坐的房間里，当时坐着他們的“大班”，指揮手下的嘍罗，每时每刻想着摧毁我們的企业。他們把我們的香烟放霉了之后唆使小販到我們公司調換，他們制造借口說我們的商标是模仿影射的，他們派出买办走狗建議收买我們

的公司，凡此种种，层出不穷。

解放前我們和頤中英美烟公司斗争了几十年，沒有絲毫損害到他們，而他們反而天天的壯大了。我們却經不起他們的压迫、傾銷，一天天的衰落下来，終於被官僚資本控制了，搞到奄奄一息。解放以后帝国主义者滾蛋了，这座“頤中大楼”也不再是帝国主义者发号施令来榨取我們人民血汗的地方，而是我們人民企业的一部分了。我們的卷烟市場也不再是帝国主义者縱橫的天下。过去我国的香烟虽然說是国貨，主要的原料还是进口的，我們不过加工罢了，今天才真正称得起国貨。我的家族从事卷烟工业几十年，我的前輩从国外回来創办事业，为了振兴国貨，堵塞漏卮，在旧社会里弄得焦头爛額。今天他們最大的願望實現了。要不是党和政府領導我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願望，事實告訴我們，也只能是空想而已。

我以前曾經不止一次地想过，我还是搞我的技术吧。有个朋友曾經半开玩笑地对我說：“你从前不是干过桥梁工程嗎？而你现在也在架桥，这是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間的桥，祖国和华侨之間的桥。”当然，他這句話我是不敢当的。不过我想将来有一天，回忆到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設的美好事业中，我也會投身其中，也會奔走过，也會出过一点点力，流过一些汗，这將是我最大的愉快。所以，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是祖国需要的，我都乐意去做。

今天，我的家庭生活也是欢乐和丰富多采的。我的妻子在国外是学音乐的，現在在家教授学生声乐，并經常參加演出，同时还在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担任文娱活動的負責工

作。我的三个孩子，大的除在学校学习外，还在学习繪画和拉小提琴，女孩也在学鋼琴。我不用为他們操心，也从不为他們担心发愁，因为国家会給他們安排工作；甚至有时我真不禁羨慕他們，因为他們將來有廣闊的前途，有更美好的生活。他們將是共产主义的建設者。

从国家，从事业，从家庭，从个人，都强有力地促使我：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始終不渝！

把自己的一切獻給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湯 蒂 因

我今年 41 岁，計算起來，已往的歲月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在 41 個年頭里，我已在工商界搞了 27 年。27 年中間，頭三年是當店員，是一個被剝削者，以後的 21 年一直做老板，成為一個剝削者。直到 1954 年企業合營後，才逐步改變自己的剝削本質，向一個自食其力、名符其實的勞動者過渡。這個過程，現在回憶起來，是艱巨複雜的鬥爭過程。

—

我的企業不是祖傳的，而是我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在舊社會里，人們創立自己的企業是很偶然的事。我那時是一個 17 歲的女孩子，女孩子在 20 多年以前，要自己辦企業，現在想來，倒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 8 歲上學，13 歲高小畢業以後，就沒有上中學，其原因是：我的父母封建意識較濃厚，說女孩子遲早是別人家的人，不象男孩子那樣將來要成家立業。我只有一個哥哥，父母重男輕女，不讓我上中學。那時我心裏老不服氣，想鬧獨立，可是又有什么辦法呢？過了一年，忽然在報上看到上海有一家文具商店招考女店員，我瞞着父母去投考，沒有想到竟被錄取了。那年我只有 14 歲，從此就走入了社會。

当店員不知受了多少气。有这么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記：当我开始站櫃台的第二天，有一位顧客問一样东西，我答不上来，这人向我白了一眼，罵道：“看你这黃毛丫头，既不会做事，又不配当花瓶。”听了这句刺耳話，我气极了，可是也决不服气，我白天工作，晚上回去，連夜念价目單，一个星期把几千种商品的价目都硬背熟了。可是顧客来买东西时，我只背得出价錢，却找不到东西在哪里，还是不行。接着我就帮着整理貨櫃貨櫃，又帮着批发部配貨，这样就一件一件熟悉起来了。原来我在高小时就做了兩年学校小商店的販賣員，卖的是鉛筆、抄本、橡皮、牛肉干、面包，連販帶卖，算錢結帳都是我，从小对这一行就很有兴趣，沒有想到出学校一年，真的当上了售貨員。因为我不服气，想爭气，所以工作很努力，第二年我就被提升为門市部主任。那时候我不仅很关心門市部的业务，而且也关心批发部的业务，更着重的是进貨部的业务，我的所謂关心，說老实話也就是“偷关子”，学本事，在旧社会学本事只能是偷偷的学。我还很注意从門市的顧客以及各地客戶来信中研究他們需要的貨物和花色品种，如果我們店里沒有，我就把它統計出来。我給老板出过主意，进了几批新品种試銷，結果老板賺了好多錢，从此他更加信任我了，第三年又把我提升为进貨部主任。那时这家文具店——益新教育用品社是当时上海几个大批发商店之一，它还兼营門市业务。我被提升为进貨部主任后，日常要接触洋行和工厂的跑街，那时我还只有 16 岁，人这么小，职权却这么大，开始人家也不大看得起我。我在工作上特別卖力，肯鑽研业务，进步是較快的。

因为我在业务經營上有些办法，当时的上海世界書局要

開闢文具部，想把我拉去，但被我拒絕了。我是这么想的：做店員，我現在的职位已相当高了，薪水每月 30 元也是很好了，所以不願換一个地方再去当店員；我还这么想：店員总归是店員，要給人看不起，要受气，尤其还要受老板的气。看看老板坐着汽車出出进进，真神气，每天吃喝玩乐，我早已打好了主意：要出去，就去当老板，这样才可以揚眉吐气。說良心話，那时候誰懂得剝削可耻、劳动光荣的道理。

二

“有志者事竟成”。到了 17 岁的时候，我真的当上了小老板。那是一个文具批发店，开在我自己家里，資金只有 1,000 元。这 1,000 元当中，一半是我的积蓄，还有一半是用搖会的方式搖来的。由于我在益新教育用品社做过进货部主任，洋行工厂都熟悉，部分商品可以賒欠，又由于我对各地客戶的情況比較了解，所以做起来倒也还順利。从这时候起，家庭生活都由我負担了，我在家里是一家之主，在店中是老板，就觉得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了。实际上，旧社会里的妇女根本就不会有地位的。

“八·一三”战争爆发时，我的店已經迁到当时的上海英租界了。那时业务上遭到不少困难，因为我店經營的是批发业务，交通受阻碍，放出去的帳，也給战火燒掉了，損失相當大，連生活也受到影响。

我沒有办法，但急中生智，就裝了一批貨，帶了兩個店員跑到遙远的昆明去开分店。那时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昆明市面真熱鬧，許多机关、學校、部队、团体都迁到那里。我鑽了对

上海市面灵，进货快，又做门市又做批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一下子成了暴发户。可是“好景不常”，敌机常轰炸昆明，滇越铁路也遭到无数次的轰炸，运输经常中断，我们积压在海防的大批货物，付了许多仓租费、小费和运输费，但始终没有运出去，到日寇在那里登陆时，169件大箱的贵重商品都损失了。几年来的心血都换成了货，原来是想抢运进来，大发其财的，结果搞得一塌糊涂，还负了债。

回到上海以后，资金枯竭，批发生意不能做了。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我在1943年又开设了一个小门市部，零售一枝铅笔一本抄本等，顾客都是些小学生。我是做生意做惯的人，做这种小生意老是觉得不称手，那时我对商业也开始厌倦了，想创办本轻利重的小工业。我看到国产的自来水笔还不多，就想办一个钢笔厂。而且我又想到如果先开了厂，产品销不出，就要亏本，所以我倒过来做，向一家小厂包了一个牌子——绿宝，在电台上、电影院、路牌、报纸杂志上大做其广告，预备把牌子宣传开了再来开厂，这样比较稳妥。果然这只棋子走得不错，因为文具行业一向没有做过这么多广告，我这样做居然大有苗头。这是在1944年。隔了一年，抗战胜利，我想这一下可以好好地搞工业了。谁知道胜利带来的是灾害，美帝国主义的剩余物资压倒了我国市场，“派克”“雅飞利”满街飞，国产品被压得没销路，老工厂都没法维持，我再也不敢下手。一直挨了两年，实在为了生活负担重，不能再挨下去，就在1947年借了一些资金，买下了一个已停业的钢笔小工业社，有5个人，8部机器，连人带机器并在我的文具店里，开起绿宝金笔厂来了。说起来也怪可憐的，8部机器是装在后厢房里，马达电也

沒有，把小馬達接在電燈上面，裝配間在灶披間，連店員，加上我的父母亲、嫂嫂都算是裝配工人，这样，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工厂就誕生了。

因为“綠寶”的牌子已做出了广告，所以銷路不差。那时鈔票不值錢，人民輕市重貨，大家都想購買东西存起来。但是名牌貨一般人买不起，因此我們小工厂出产的自来水筆也應运而起，成为被搶購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生产也有了发展，职工很快增加到 30 多个，成为一个中型工厂了。可是伪金圓券的搶購劫風，把我的产品“限价”搶光了，連我們做金筆用的黃金，也被搜光，收下的“金圓券”却补不到原料，等到买进原料，“限价”早就“不限”了，物价已經漲了几倍，我吃了大亏，逼得我用高利借款，一天出一倍的利息，使我負債累累。1949 年 2 月，企业因为資金周轉失靈，我不得不解雇了一部分职工，將原有的原料制成鋼筆后，七成折还債权人，三成出售維持生活，以苟延殘喘。要不是那年 5 月份上海就解放，前途真不堪設想，因为那时我已到了山窮水尽的地步了。

三

上海剛解放时，我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認為共产党来了对資本家不利。但是我那时也根本沒有什么資產了，自己也不承認是資本家，对共产党虽有怀疑，但是对国民党实在也恨透了，苦头也吃够了，所謂穷就想变，变也許就会通，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迎接解放的。

真想不到，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翻身了！解放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热潮，自来水筆已不是少数人的裝飾品，而是

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工作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了。自来水笔工业，在人民政府的挽救和扶植下，从奄奄一息中甦生过来，克服了困难，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1950年，政府配給我們黃金，产品由国营公司收購；資金不够，由人民銀行貸款。1950年，我的厂每月只能生产 200 打金笔，到 1953 年，每月就能生产 2,200 打了，增加了 12 倍；职工也增加了，生活福利也有了改善，年年有盈余。1952 年我参加了偉大的“五反”运动，又在当年参加了第二届赴朝慰問团，到朝鮮前綫慰問中国人民志願軍，亲眼看到和听到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开始看到了自己的丑惡本質。我过去做生意只是为自己打算，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己办工厂，从来没有想到产品能不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例如連自来水笔的最基本的毛病“漏水”到底是什么原因，自己也說不上来，从来也不去研究解决，所謂“出門不認貨，只要能賺錢”，这就是我的打算。在朝鮮看到不少志願軍同志的自来水笔有毛病，沒有地方修理，他們苦悶得很。有些志願軍同志对我說：自来水笔是我們向文化进军的武器，太重要了，写不出来，象枪沒有子弹一样；我們买一枝笔不容易，可是坏起来太容易了。他們要求祖国的工业家多做更好的笔，來支援前綫。我听了以后臉紅到耳根，感到又慚愧又激动，說不出的难受。回到祖国我向同业傳达了志願軍战士的要求，同时决心要把自己的生产搞好。这时候我們全业不論大厂小厂出产的产品已經由国营公司包銷了，包銷后出現了新气象，同业間自由競爭沒有了，大家團結合作，互相公开技术，交流經驗。1953 年，我的企业与兩家同业合并，成为一

个有笔尖设备的 160 个职工的工厂(北京还有一个 80 个职工的分厂)。企业合并后，资金、设备、人力、技术都能更好地加以利用，这就为逐步改进技术和改善经营管理打下了基础。

1953 年，我学习了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唯一的光明大道，于是便提出申请公私合营，在 1954 年，北京分厂和上海总厂先后被批准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后出现了新面貌。1955 年政府又根据大厂带小厂的方针，批准我们厂并入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在 1956 年全行业大合营后，又并入了 20 多个中小型工厂，现在我们的厂已经是拥有 800 多个职工的一个大厂了，它生产的英雄、华孚、新民牌金笔，不仅畅销国内各地，还有部分出口，厂里的面貌天天变，新人新事，层出不穷，这是我多少年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四

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士对于我们党的和平改造的政策都很关心，很感兴趣。他们来到上海，都要来参观我们的工厂，访问我们的家庭。他们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资本家，怎么能够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亲手交给国家，不难过，反而愉快？而且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我们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每当最后分手的时候，他们都祝贺我们，说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幸福的资本家”。我们怎样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呢？概括的讲，我们总是把四笔帐算给他们听，也就是我们在学习总路线时自己算过的四笔帐。

1. 从資本家办企业的願望來講：

我們資本家办企业，总希望办得越大越好，可是在旧社会里，帝国主义侵略我們，官僚资本主义大魚吃小魚，这是人吃人的世界，許多人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真是风雨飄搖，朝不保夕。我自己就是过来人，解放前 30 多个职工的厂也保不了，那里談得上发展！解放后只短短几年，却发展得这样快：职工人数增加了，厂房是新建的，在郊外綠化的环境里，夏天涼快，冬天暖和，車間里有各种各样的劳动保护設備，厂里有饭厅、礼堂、疗养室、托儿所、浴室、运动場、图书室、职工夜校、集体宿舍等等，职工上下班有交通車接送，我們的工厂过去在小弄堂里，缺乏光綫、空气，好象鴿子棚一样，和現在比較一下，真是天淵之別。我們厂里的机器設備都在逐步改进，有的由手工操作改进为自动化，例如自动磨錶車、自动試写机等都是厂里自己創造改进的。現在我們厂已經是一个全能工厂，每一件另件都能自己做。职工們还仿制苏联摺疊皮管，解决了自来水笔漏水的毛病。現在，我們厂里新品种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1957 年，估計要比 1956 年降低成本 8 % 以上。这在合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帝国主义的傾銷侵略，官僚資本的压榨排挤，关厂、停工、失业的痛苦是一去不复返了。

2. 从个人和家庭生活來講：

过去資本家办企业，为的是要自己生活好，家庭儿孙有保障。可是資本家在解放前生活不稳定，一会儿暴富了，揮霍浪费，一会儿企业倒闭了，就束紧褲帶；老話說：“富貴不出三代”，有了錢，强盜綁票、子女墮落；經營失敗时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这是很平常的事。現在資本家生活安定了，以我來講，現在工資和津貼每月收入 232 元，每年還有定息 2,000 元可得，生活过得很好，很愉快，用不了的錢，可以拿出一部分來購買公債等。

3. 从工作和前途來講：

我小的時候想做老板，就是為了要爭氣，要人家看得起，自己开店开厂封自己為經理，可是這個經理也當不牢靠，在舊社會里，一個婦女根本是沒有人看得起的，只有在解放後，婦女才真正得到了和男子一樣的平等的權利。幾年來，黨和政府對我很關心，經常培養和教育我，我現在擔任華孚金筆廠的經理，這個職務是政府任命的。在政治生活方面，我还當選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毫無疑問，只要自己努力學習，積極接受改造，踏踏實實的工作，一定可以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與全體人民一道進入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

4. 从國家來講：

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我們中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我也是中國人，當然也不例外。解放前，我們國家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獨立自主。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國家決不能有今天的獨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國家決不可能富強。這些道理，從我們自己的親身體驗中已經証實了，是再也不用懷疑的了。現在我所要考慮的只是這麼兩個問題：

第一，解放前我對革命沒有什麼貢獻；解放後所做的也是很微小的一些工作，却得到黨和人民這樣的信賴和尊重，得

到了这么高的荣誉和地位，以及愉快的生活条件，真所謂是“有名、有利，有职有权”。在我們的国家里，不容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因此我要把自己有益于人民的一切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貢獻給偉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第二，我所担负的工作，和我的能力不相称。因此我要加紧改造，努力学习，改变資产阶级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通过学习和實踐，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和教育。